

青少年初期身心健康變化及其 動態影響變因之討論

吳齊殷 黃鈺婷

研究目的：本研究運用一項長達三年(1996-1999)，有關青少年成長與發展調適問題的貫時性追蹤資料，嘗試突破橫斷性資料的研究困限，應用潛在成長曲線模型分析(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將青少年跨時間的憂鬱症狀軌跡描繪成型。家庭是青少年最為熟悉且受到最多直接影響的生長脈絡，也是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的關鍵性結構因素。本研究納入個體自尊、與家庭脈絡下的因子(父母親嚴厲管教與低親子關係滿意度)，以做為耙梳幾個危險因素，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初始狀態與變化率產生的負向與長久影響。**研究方法：**以944個國中青少年學生重覆填答之測量資料，做為分析青少年初期身心健康變化及其動態影響變因。**研究結果：**1.在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動態變因方面，青少年的低自尊會同步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初始狀態與軌跡發展，是造成青少年「暴露」在長期憂鬱症狀之下的最關鍵危險因子。2.進一步分析家庭脈絡之不利危險因素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變化的影響發現：不良的親子互動關係確實會對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發展造成深遠的影響。3.青少年的憂鬱症狀受母親嚴厲管教的影響僅及於起始狀態；但低親子關係滿意度卻是影響青少年長期憂鬱症狀發展的動態變因之一。**研究結論：**自尊、家庭脈絡中的動態變因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確實具不同時序的影響效果。

關鍵詞：青少年、軌跡、憂鬱症狀、動態變因、潛在成長曲線模型

吳齊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專長為家庭社會學、社會學方法。(通訊作者；E-mail: sss1ciw@gate.sinica.edu.tw)

黃鈺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育心理與輔導組博士；研究專長為教育心理與輔導。

收稿：2009年7月10日；接受：2010年2月5日。

一、導 論

近年來，許多實証調查的數據顯示，年輕世代的憂鬱疾患比率漸有呈現上揚的趨勢(陳為堅，2005；楊浩然，2001)。過去許多與青少年發展問題相關的研究，大多致力於瞭解個人與家庭系統內諸多變因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負向影響。其研究結果揭示出許多直接或間接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危險因子，諸如：內向歸因(Masten & Garmezy, 1985)、負向情緒經驗與情緒因應失調(楊雅惠，2003)、負向生活事件(黃鈺婷，2007)、家庭結構改變、失功能之父母(Courbasson, Endler, & Kocovski, 2002; Wu, Huang, & Chang, 2006)、不良父母管教方式(Trumpeter, Watson, O'leary, & Weathington, 2008)等。這些實證研究的結果，透過橫斷性的資料，將個人的憂鬱傾向與青少年主要成長的家庭脈絡之間，做關係聯結的模型建構與分析，這些文獻上的累積，確實有助於我們系統地瞭解青少年憂鬱症狀發生的可能因素。但是，採用橫斷式資料分析的限制在於：這些採單一時間點所測量到的現象，只反映一個靜態的當下，卻無法推論在時間演進之下，現象本身可能受到的影響與動態之轉折變化，也因此產生了研究發現在推論上的限制。此外，類似的研究，仍多以一個特定時間點的憂鬱症狀測量，或是在某一特定觀察時間點所見之單次測量的全體樣本平均數、或某一選定的截斷點(cutting point)，來描述全體青少年樣本的個體與團體之變化情形，並被迫依循固定的憂鬱症狀發展路徑，預測所有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發展軌跡。這樣的研究，只能短暫觀察到青少年在生命成長過程中某一個時間點下發生的片段，缺乏對歷史時空脈絡的縱向觀照。而依此說明所有樣本的青少年，皆展現出共同的身心發展樣貌，則可能因此做出以蠡測海的結論，忽略部分青少年，將隨著時間而表徵出不同身心健康狀況的事實。欲進一步瞭解個體長時期憂鬱症狀發展變化情形，若不藉由長期追蹤與重覆測量的資料，捕捉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的演變軌跡，僅憑單一時間點的測量資料，勢必無法回答這些跨時間成長的演變情形與特殊現象；亦將難以討論隨著時間推演，個人內在屬性成長與轉折變化情形，更難以突破造成個別差異之前因後果、與影響層面的時效性觀測等問題(Singer & Willett, 2003)。

本研究的目的，意在模塑青少年在青春期初期階段的內化症狀發展與演變，以及釐清內化症狀與家庭結構環境間的交鎖關係，作為論證當代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軌跡的論據。為考量時間的縱向脈絡因素，本研究企圖以潛在成長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LGC)，具體呈現青少年憂鬱症狀，隨時間變動，在數個觀察時間點間的變化軌跡，以便貼近地描摹青少年個別憂鬱症狀發展的軌跡變異。本研究並分析檢視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發展軌跡所呈現的動態轉折，藉以說明青少年在國中階段所展現出的身心健康變化情形。

對於青少年來說，家庭系統無疑是他們最熟悉且受到最多直接影響的日常生活脈絡，因此，青少年在家庭脈絡當中所遭遇的人事物，成為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的重要結構因素。本研究企圖以一般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長期發展與變化為題，從個人長久生長之家庭結構環境脈絡中的理論立場出發，以「動態」的概念變項為主軸，依序由微觀而至鉅觀地探究這些分屬個人內在因素、個人與家庭脈絡因素的關係互動狀態，如何與個人憂鬱症狀的變化之間產生關聯，並依以闡明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的差異關鍵、及其動態歷程。

過去文獻雖致力於思考：究竟是哪些原因致使青少年變得更為脆弱的問題，卻無法明確地指出：每一個身處家庭不利成長條件的青少年，是否都將依循相似的發展途徑，擁有較差的身心健康表現？最終這些處於充滿危險因子之家庭生活環境，而相對較易感(vulnerable)於結構因素影響的青少年，是否將無可避免地要受到憂鬱症狀的侵擾？除了精確地描述所有受訪樣本在憂鬱症狀發展上個別的變化軌跡之外，本研究亦意圖藉由考量時間的縱深，觀察來自個人自身、家庭脈絡關係的負向影響，是否具有前後時序的層次效果，以檢證理論的預期。

總之，本研究試圖透過對家庭脈絡負向關係的觀察與測量，做為探討「如何緩解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機制」系列研究的開端。本研究以台灣社會的一般國中學生(非以臨床病例樣本為對象)做為分析觀察的對象，視青少年憂鬱症狀改變的歷程為動態的軌跡變化。本研究緊扣住個人內在能力以及家庭脈絡中的關係互動，嘗試聯結個人與家庭脈絡中的重要影響因素，找尋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軌跡、與造成個別差異之運作機制。此舉，不論在具體的實證研究發現，抑或在理論層次的釐清，都同具意義。

二、文獻探討

(一) 青少年憂鬱症狀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所屬的專刊，於2001年度的《世界健康報告》(*The world health report*)中，以精神健康為題，呼籲全世界各國與國際組織正視憂鬱症對個人、家庭、社區以及社會各階層與國家廣泛嚴重的影響。WHO(2001)的報告指出：憂鬱症在復原後兩年內，仍大約有35%的人會面臨復發(recurrence)的情況，這對個人認知、社會功能、乃至未來生活適應等等，都有深刻的負向影響。

楊浩然(2001)所進行之青少年憂鬱症狀及憂鬱疾患追蹤研究，針對台北市2,447位國中生進行的盛行率估計發現：台北市青少年憂鬱疾患盛行率(青少年女孩重鬱症的盛行率為：5.3-5.6%；一年期：14.5-19.4%；男孩為：1.5-1.6%；一年期：2.8-3.5%)與國外青少年憂鬱疾患憂鬱症盛行率5-8.3%相當。教育部訓育委員會於2003年至2004年，針對10-18歲學校學生憂鬱傾向推估的專案研究報告顯示：國內青少年重鬱症盛行率高達8.66%(陳為堅，2005)，與國外青少年憂鬱疾患盛行率分佈的比例趨向一致，顯示國內年輕世代憂鬱疾患，在青春期呈現上揚趨勢。

目前國內相關研究對青少年內化症狀的研究關注，主要可歸納出幾個方向：其中包括個人(性別、年齡、自尊、歸因組型、自我效能、壓力知覺與因應策略等)、家庭(家庭結構、社經地位、負向生活事件、雙親教養方式與態度、依附情感等)、學校或社會(學業挫折及朋友支持滿意度等)，各層面對於個人身心健康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徐世杰，2003；楊雅惠，2003)。這些研究多以壓力因應、認知行為及發展理論等觀點，來解釋個人對於壓力的評估與因應，並各有所重地在其間的因果關聯上，說明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情形及後續影響，並試圖歸納出預測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關鍵性危險因子。藉由這些實證研究結果的累積，我們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成因與因應策略，漸有所領略與掌握。

這些針對青少年憂鬱症狀危險因子的研究結果，延伸出一個更重要的研究問題：既然青少年無可避免地會受到其日常生活脈絡中危險因子的影響，那麼，倘若

跨時間長期地觀察個別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與變化情形，是否所有易感於環境危險因子、且曾經表現出較多憂鬱症狀的青少年，都將展現出一致的憂鬱症狀發展結果？抑或，隨著時間的演進，個別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軌跡，會逐漸展現出差異性，而有不同的變化與動態轉折，而在憂鬱症狀的發展軌跡上，也展現各自獨特的發展歷程？本研究因此欲瞭解台灣一般青少年，在憂鬱症狀上的長期發展與個別差異所在。根據吳齊殷、李文傑(2003)的長期追蹤研究發現：每一個青少年都有其獨特的內化症狀發展軌跡；亦即，每一個青少年都自有專屬與獨特的症狀發展記錄，有些青少年「因故」得以維持平穩的身心健康狀態；有些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發展「因故」而一路惡化且益發嚴重；但也有部分的青少年，在跨時間的長期追蹤觀察下，則亦「因故」而呈現憂鬱症狀的緩解改善。換言之，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假設是：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發展，是動態的個人軌跡變化。

(二) 青少年個人自尊與憂鬱症狀發展

個人內在所擁有的心靈力量與性格，例如具生活控制感、自律與自制力(Brooks & Goldstein, 2004)、同理心、利他、進取心、責任感(Grotberg, 1997)等等，這些生命個體於成長過程中逐步發展出的能力或長處，一旦累積生成，則這些個人的屬性，將醞釀轉化為個人所能擁有的重要內在資產或個人資源(Gramezy, 1985)，進而強化為自尊，最終成為個人面對挫折時的內在力量。

楊順南(1995)的研究結果顯示：個人的自尊感對其憂鬱症狀的發展，具反向的抵抗力。黃鈺婷(2007)的研究發現：個人的自尊起伏與憂鬱症狀變化之間，呈現負關聯的關係，這個結果反映：自尊分數的高低，能預測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變化軌跡，顯見個人的自尊，為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跨時間發展與改變的關鍵因素。如同Elder與Conger(2000)所指出的：「較易受到傷害的孩子，往往在經歷具重大壓力的人生轉捩點時，特別容易暴露在發展出問題行為的風險之中」，自尊低的孩子，往往就屬易受傷害的類屬，在初始時，即表現出比平均來得差的起始憂鬱症狀分數，長久下來，更將隨著時間，而表現出相對較差的身心健康情形。因此，在討論青少年個人自尊與其憂鬱症狀的跨時間關聯時，自尊亦應同被視為隨時空演進

而持續變動的概念。

本研究的第二個假設乃是：青少年之低自尊的基點、與變化方向及速率，會同步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初始狀態、與發展軌跡。換言之，「低自尊」乃是造成青少年長期「暴露」在憂鬱症狀惡化情況下的關鍵危險因子。

(三) 家庭脈絡之不利危險因素與青少年憂鬱症狀

研究文獻大多指出：在找尋令危機中個體產生憂鬱症狀困擾的危險因子時，除個人己身之外，青少年在主要成長場域中的互動關係，最有可能蘊藏讓青少年在憂鬱症狀上產生不同成長軌跡的關鍵危險因子。青少年早期的重要生活場域乃是家庭，源自於家中成人(主要為父母)的問題、或親子不良互動的日常生活經驗，對大部分的青少年來說，是形成壓力與挫折經驗的主要來源。Amato(2000)、Wu等人(2006)的研究結果，都一致發現：青少年早期所經歷的負面生活狀態，對其憂鬱症狀的預測具顯著效果，而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發展結果，亦具負向影響。

近年來，國內外針對家庭因素與青少年憂鬱症狀之間因果關係進一步的研究結果則指出：家庭經濟狀況雖會影響青少年的憂鬱症狀，但只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並非長久影響其憂鬱症狀變化的關鍵因子。換言之，那些原本成長於較不利之家庭脈絡中的青少年，雖然確實會比其他成長於較完整家庭結構中的同儕，遭遇更多負面生活事件的衝擊，相對而言有較高的危機與風險，但是，並非所有負向生活經驗與家庭結構，會對所有的青少年造成負向的影響(黃鈺婷，2007)。Bertera(2005)針對正向社會支持與個人關係中的負向互動的研究發現：與父母親之間的負向互動關係，才是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起始狀態的關鍵因子。對於青少年來說，親子滿意度是一種源自過去累積而來對於與父母親關係品質的內在感受，對親子關係滿意度較高的青少年，在憂鬱症狀分數的起始平均數表現上，顯著不同於對親子關係滿意度較低的青少年(黃鈺婷，2007)。以上的結果顯示：來自家庭脈絡之中的父母嚴厲教養、與親子關係品質的負向評估，皆是誘發青少年產生憂鬱症狀的危險因子，當青少年正處在關鍵的成長發展歷程之時，如若長期處在一個負向的親子互動脈絡中，其對於負向親子互動的反饋，即可能反映在個人的憂鬱症狀發展軌跡

上，終而致使部分的青少年，因受制於家庭脈絡的不利條件，顯現較差的身心健康發展。

總結以上這些研究，青少年的自尊與其父母親的管教行為，以及青少年對其親子關係滿意度的評估，皆是影響個別青少年憂鬱症狀起始狀態的變因。亦即，對有些青少年而言，即便不是生長在失功能的家庭脈絡中，其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仍受其個人主觀意識所認知的親子互動關係的影響。已有許多研究試圖透過觀察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歷程，從家庭關係聯結的觀點切入，探索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所建構的關係脈絡，如何對其身心發展產生影響。以台灣社會中的青少年而論，時值青春期的國中學生，家庭仍是形塑他們價值觀與個人生活能力的主要場域，著重家庭脈絡中的「垂直關係」脈絡，以探討青少年在日常生活場域中與父母之間的互動情況，檢驗與父母間不良的互動情況，是否即為導致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危險因子，乃是具體找出預防與補救之雙重對策的不二法門。換言之，針對早期即已處於不利家庭成長環境、或不良親子互動關係的青少年，將有助於確認是哪些關鍵因素，使得這些孩子在危機中，朝向不良後果的軌跡發展。

國內雖有類似的研究致力於找尋來自家庭的危險因子(徐世杰，2003；康維芬，2005；楊雅惠，2003)，但囿於橫斷式資料的先天限制，這些研究未能解釋清楚一些更深層的問題：這些危險因子的影響效果是短暫的或是長期的？這些危險因子又是如何跨時間地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差異與變化軌跡？為擴增對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的理解廣度，藉由長期資料觀察憂鬱症狀的變遷發展，方令與青少年憂鬱症狀相關的議題討論更臻完整。為捕捉青少年之憂鬱症狀隨時間演進而呈現的動態改變歷程，本研究嘗試模擬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軌跡(包括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變化速率)，並透過共變因子的考量，找尋造成青少年憂鬱症狀不同發展軌跡的關鍵。過去文獻中採用單次資料測量、或以觀察團體變化為主要的研究，皆無法說明青少年在憂鬱症狀上的動態變化的歷程。本研究則在貫時性的關照下，觀察時間與共變因子作用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上的影響，克服採用單一時間點資料所無法解釋清楚的演變歷程問題。

為在理論上釐清共變危險因子作用在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淨效果，我們進一步將

關係脈絡，在概念上定義為上下垂直關係。上下垂直關係是一種對成人的結構關係依賴，青少年在家庭裡所面臨的垂直關係脈絡，包括父母親的管教，以及與父母親日常互動關係的評估。此垂直的關係脈絡，是否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發展軌跡皆有顯著的影響，抑或，只限於對其初始狀態有影響，而無法預測青少年憂鬱症狀變化方向與速率？根據生命歷程理論中「轉捩點」的理論概念(Sampson & Laub, 1994)，本研究假設：家庭脈絡中的上下垂直關係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影響，應只發生在早期(初始狀態)，而隨著青少年的生活重心逐漸轉移到學校脈絡，將會減緩其影響效果。換言之，感受到來自父母親愈負向嚴厲管教的青少年，將顯著地展現在憂鬱症狀的起始分數上；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關係滿意度愈低，亦將顯現在其憂鬱症狀的起始分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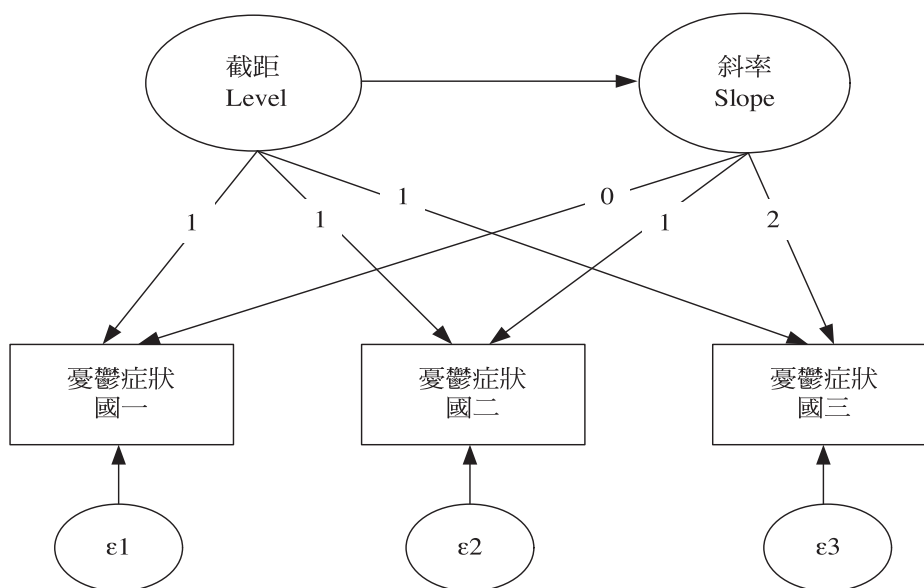
三、研究設計及方法

(一) 研究架構

圖一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是以青少年在國中就學期間，三個時間點(國一、國二及國三)的憂鬱症狀重覆測量分數，做為兩個潛在變項(latent variable)，起始狀態(截距)和成長速率(斜率)的測量指標，用以捕捉每一位青少年在國中三年間之憂鬱症狀的發展軌跡。LGC模型乃針對每一個青少年的個人憂鬱症狀發展軌跡，描繪出一條各自所屬的迴歸線，做為反映個人內在憂鬱症狀成長之起始狀態、方向改變及速率變化的基本訊息。

圖一的研究架構中，憂鬱症狀之截距與斜率兩潛在變項間的因果關係設定，用以檢證青少年的憂鬱症狀起始狀態對其憂鬱症狀變化速率及方向的影響。

在以圖一研究架構的成長曲線模型，描繪出每一位青少年之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的長期變異情形之後，圖二的主研究架構中，再加入來自個人與家庭脈絡中的危險因子，深入探討低個人自尊、父母嚴厲管教、與低親子關係滿意度等潛在變因，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與長期變化的影響。本研究以低個人自尊、母親與父親之嚴厲管教、以及低親子關係滿意度等四個潛在變因，做為國中三年期間，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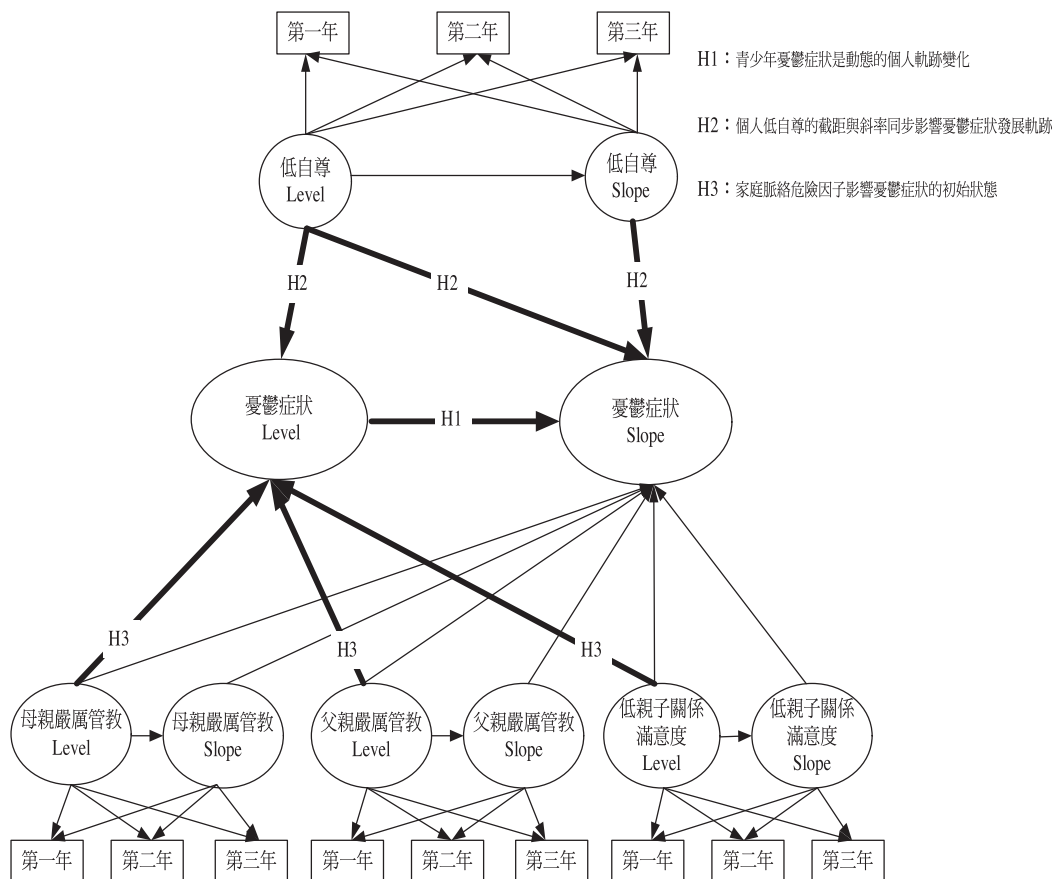
圖一 三個時間點的憂鬱症狀潛在成長曲線模型

青少年憂鬱症狀起伏變化的共變因子。如前所述，本研究預期，青少年個人的低自尊，將持續扮演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的關鍵因素。至於家庭脈絡危險因子對於憂鬱症狀的影響方面，本研究預期這些動態變因影響的，是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來自家庭中的危險因子，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的預測，並不顯著。相較於父親的情況，本研究預期母親的嚴厲管教，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情形，將有較為顯著的影響效果；至於青少年對於親子關係的感受滿意度高低，亦為影響青少年在國中階段憂鬱症狀變化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的焦點置於家庭脈絡中，上下垂直的關係脈絡，企圖釐清家庭脈絡中父母管教、與感受到的親子關係，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影響，究竟有多深多廣。圖二的研究假設示意圖，分別以H1、H2、H3，呈現本研究三個研究假設之命題所在。

(二) 資料與樣本

本研究使用國家衛生研究院資助之「青少年藥物濫用之起因：一個社會學習模



圖二 個人低自尊、家庭脈絡危險因子及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潛在成長模型

型」研究計劃(1996-1999)所蒐集的貫時資料。該研究計劃以在1996年秋季入學的台北市86所公立國中之國一學生為研究對象。此資料庫連續三年追蹤固定樣本，重覆測量青少年學生的身心狀況在國中三年期間的發展軌跡。本資料庫依分層比例隨機抽樣原則，第一階段先抽選學校，依照台北市12個行政區的學校比例，各區分別抽出二至四所學校不等；第二階段再從各抽樣學校中，依學生人數比例抽出一或二個班級；共抽出分屬33所國中的44個班級，總計共1,434個國一學生，作為追蹤研究樣本。抽樣過程中，各抽樣階段之各校班級被抽取的機率皆相等，樣本的基本變項分配亦相當接近台北市國一學生母體。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調查資料，主要以受訪

學生於國一至國三期間，三次追蹤調查的自填資料為主。在每一次的測量過程中，所有學生依照其真實情況填答；而本研究在資料的處理上，會先將每一個受試學生轉換成特定的代碼，確保所有資料的處理均為匿名方式，並且是以全體的資料、而非以個別的資料進行分析。1,434個學生中，同一樣本連續參與前兩年的問卷調查施測者，共計1,354位學生；最後，三年皆參與該項長期追蹤調查的樣本學生共計1,304人，連續三年皆參與追蹤調查之樣本完訪率為90.9%。本研究樣本的遺漏值採完全除法(list-wise)的方式處理，因此，總共有944個樣本，在所有的研究變項上提供完整無缺的資料，被納為本研究最終進行所有資料分析的對象。

(三) 主要變項測量

為直接檢驗研究假設，本研究的主要研究變項為青少年「憂鬱症狀」、「低自尊」、「母親嚴厲管教」、「父親嚴厲管教」以及青少年的「低親子關係滿意度」。在連續三年的追蹤調查問卷裡，這些變項的測量，皆連續三年重覆出現，因此本研究可以運用三年完全一致的問題，建構每一個概念變項在國中三年施測時期的重覆測量；換言之，以下各研究變項在三個測量時間點，皆有三年一致的重覆測量。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經多年的討論與測試使用，並在既存之研究文獻中呈現出極高之內容效度，問題的用字遣詞能反映出測量概念的程度；量表信度係數皆在.65以上，可見本研究所使用的測量工具，皆在可接受的信度範圍，表示在不同時間點的重覆測量具穩定及一致性。以下分別就各變項指標的建構原則，加以說明：

1. 青少年憂鬱症狀

本研究關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測量，係採用改良過的The Symptom Checklist-90-Revised量表(Derogatis, 1983)，本研究所使用的長期測量資料，包括此SCL-90憂鬱症狀測量量表的五個向度；亦即，體化症、敵意、憂鬱、焦慮及其他等，共四十七題。該量表的信度 α 值在三個測量的時間點皆大於0.9。SCL-90為五點量表，答項由1至5，1代表一點也不會，5代表非常嚴重，請受試之青少年針對量表所列出的症狀，填答在過去一個星期中，他們是否為上述之四十七個題項所列的症狀所困擾？最後將受訪者在每一個項目的得分加總起來，即為該青少年的「憂鬱症狀」分

數，分數越高者代表有愈高的「憂鬱傾向」。本研究以憂鬱症狀分數做為反應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核心概念，此所反映的是青少年所主觀感受到在身心症狀上不舒服的程度，其目的並不在於評量性的診斷。

2. 低自尊

青少年「低自尊」的測量，本研究計劃使用的量表係依Rosenberg(1965)自尊量表的觀點，修訂自編而成，該量表的信度 α 值在三個測量的時間點分別為.65、.73、.74。受試者針對自尊量表所列出的六個問項：「1.我沒有辦法解決自己的某些問題」、「2.我沒有辦法控制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3.我用積極樂觀的態度看待我自己」、「4.我很滿意我自己」、「5.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很沒有用」、與「6.有時候我會認為自己一無是處」，選擇一個符合自己情況的描述。答項由1至5，依次為1.很同意，2.同意，3.不確定，4.不同意，5.很不同意。本研究的計分方式為：先將第一、二、五及六問項，反向編碼，再將六個題項相加，即為該受試青少年在此「低自尊」測量上的分數，分數愈高表示青少年個人愈低的自尊。

3. 母親嚴厲管教

本研究測量青少年所知覺的「母親嚴厲管教」狀況。受試青少年針對「當你和母親聊天或一起做事情時，她對你的態度如何？」的題幹，一一評估下列五個狀況：「1.很生氣地對你大吼大叫」、「2.跟你吵架」、「3.跟你打架」、「4.掐你、擰你、打你、或揍你」、與「5.哭喊、叫罵、或嘮叨」，依七點量度的答項，從1.幾乎總是、2.總是、3.常常、4.有一半時間、5.不太常、6.幾乎沒有、到7.沒有，分別評估這五個狀況的發生頻率。本研究採反向計分，最後將五個題項的得分加總，分數愈高表示該青少年知覺到其母親愈嚴厲的管教方式。該量表的信度 α 值在三個測量的時間點分別為.76、.78、.78。

4. 父親嚴厲管教

與「母親嚴厲管教」的測量一致，本研究測量青少年所知覺的「父親嚴厲管教」狀況。與評量「母親嚴厲管教」方式一般，受試青少年也針對「當你和父親聊天或一起做事情時，他對你的態度如何？」的五個可能狀況，依據上述之七點量

度，分別評估。分數愈高亦表示該青少年知覺到其父親對其採取愈嚴厲的管教方式。該量表的信度 α 值在三個測量的時間點分別為.74、.78、.76。

5. 低親子關係滿意度

本研究「低親子關係滿意度」的測量，是請受試青少年依：1.很滿意、2.滿意、3.不滿意、到4.很不滿意四個答項，回答有關青少年個人對於與父親及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滿意程度的描述。計分的方式，是將兩個題項的分數相加，分數愈高反映出該受試青少年與父母間愈低的親子關係滿意度。該量表的信度 α 值在三個測量的時間點分別為.64、.69、.73。

(四)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主要納入時間因素的考量，以描繪青少年憂鬱症狀隨時間變化的情形(change over time)。由於本研究試圖掌握青少年於三年的觀察資料中所呈現之個人層次(within-person)的變化軌跡(changing trajectory)與成長差異情形，而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的分析方法，可以處理長期重覆測量資料中(panel data)，個人在某一變項上隨時間演進的成長與變異情形(Duncan & Duncan, 1995; Willett, 1988)。因此，為了說明個別青少年在這兩個變項上長期的個人內在變化情形，即在一個觀察變項中檢證個別青少年的變化軌跡，需要兩個潛在變項，亦即估測個別青少年在憂鬱症狀上的「截距」(intercept)與「斜率」(slope)，共同來建構變化軌跡這個概念(兩個潛在變項皆以在三個時間點的重覆測量變項，作為其測量指標)。藉由對變項起始狀態(initial level)的估計值、以及隨時間改變而成長的速率(growth rate)，可描繪個別青少年的憂鬱症狀變化軌跡，說明個別青少年在多個時間點之間，其憂鬱症狀的發展變化情形。藉由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的使用，尚可進一步探討影響憂鬱症狀成長速率的變項，及隨著時間而產生的個別差異情形。總之，潛在成長模型分析方法，讓研究者能夠在一段限定的時程內(例如國中三年的時間)，檢驗長期貫時性資料中，個別青少年屬性的成長變化情形或穩定性。

潛在成長曲線模型基本上屬於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的一員，不過它除了使用某一變項的重覆測量，作為一個或多個潛在變項的實際觀察

指標之外，不但使用了共同變異變矩陣的資訊，尚運用平均數結構(mean structure)分析，加上各指標的平均數，檢驗縱貫研究資料中所呈現於平均數差異的動態(dynamic)變化趨勢；而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的共變分析，則是在加入特定的成因變項之後，檢視這些具理論依據的特質因素，如何影響起始的狀態與軌跡變化的方向與速率(Willett & Sayer, 1994)，可做為判定所加入的特定成因，是否就是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軌跡演變的重要機制之用。

本研究著重探討在家庭脈絡下，其所屬的危險因子，如何影響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發展軌跡？因此，在分析模型中，加入了與家庭脈絡相關的危險因子，進行具理論意義的因果關係解析，探討這些因素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短期、與長期影響效果，並確認這些危險因子各自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起始狀態、與變化軌跡的淨影響量。本研究的模型分析方法採用統計軟體LISREL8.54版，並提供適配度統計數值(goodness of fit statistics)，以做為判斷理論建構的模型與實際資料結構之間的契合情形，而研究結果則是以完全標準化(completely standardized solution)係數呈現。

四、分析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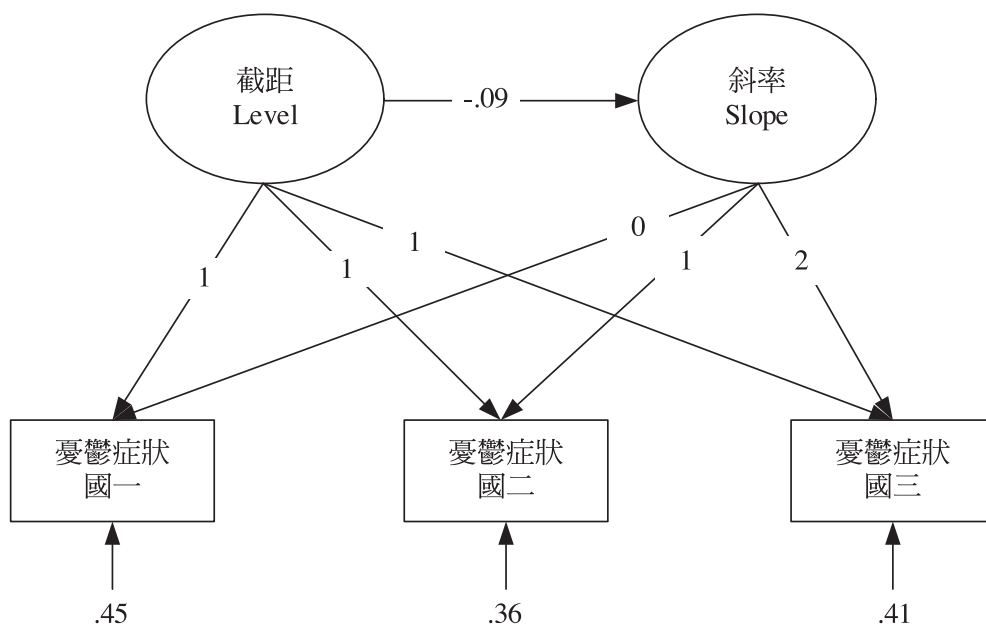
(一) 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軌跡

過去研究使用整體平均數來看變項的特性時，多採單一時點的橫斷式測量資料，其所獲致之全體平均(截距)乃是靜止的常數值，雖然能觀察到整體的改變，但無法清楚地捕捉個人發展結果的變遷差異情形，往往忽略了憂鬱症狀發展路徑不同於大多數青少年的「少數」青少年的特殊情況，致使常常出現以偏概全的偏誤解釋，無法適切地將所有青少年憂鬱症狀的長期變化情形造影出來。本研究所採用的成長曲線模型，則因此在考量時間的變動下，捕捉到了團體平均之外，青少年在個別憂鬱症狀上的發展。

本研究進一步推敲在國中時期三個不同時點，發生在每一位青少年身上的憂鬱症狀發展軌跡。圖三所示之青少年憂鬱症狀成長曲線模型，是以國一(t1)、國二(t2)到國三(t3)青少年憂鬱症狀的重覆測量，作為測量指標，將憂鬱症狀之起始狀態(截

距)與各時點之測量變項間的負荷值統設為1，以表示在起始狀態時的測量關係。另將憂鬱症狀變化(斜率)與各時點之指標間的負荷值，分別固定設為0(國一)、1(國二)及2(國三)，作為衡量青少年憂鬱症狀線性發展軌跡的理論設定。透過設定模型與實際資料之間適合度的檢證，評量在三個觀察時點，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以及成長斜率的變化情形。本模型的適配指標： $\chi^2 = 26.15(df=1, p=0.00)$ ；CFI、NFI這兩個常用指標均達大於.90標準，綜合幾個不同的適配指標，模型雖然尚有修正空間($p > .05$)，但適配分析顯示：本模型與觀測資料之間，具模型適切度。

圖三所示：LGC模型之截距對斜率的影響，未達統計顯著水準($\beta = -.09, p > .05$)，意味著：青少年憂鬱症狀在國一時所測量到的分數，並不影響其在國二或國三階段平均數的變動，亦即：青少年的起始憂鬱症狀狀態，並不會影響到青少年在後來國二和國三時，憂鬱症狀發展的斜率。也就是說，即使青少年在國一階段顯現



N=944, Degree of freedom=1, Chi-square=26.15(P=0.00)
CFI=.97, NFI=.97

圖三 青少年憂鬱症狀三個時點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

較高的憂鬱分數，並不能做為預測這些青少年在之後兩次的測量時間點，憂鬱症狀分數的增加或減少。這個分析亦透露：青少年的生命成長歷程中，青少年的憂鬱症狀變化，並非依循著穩定不變的路徑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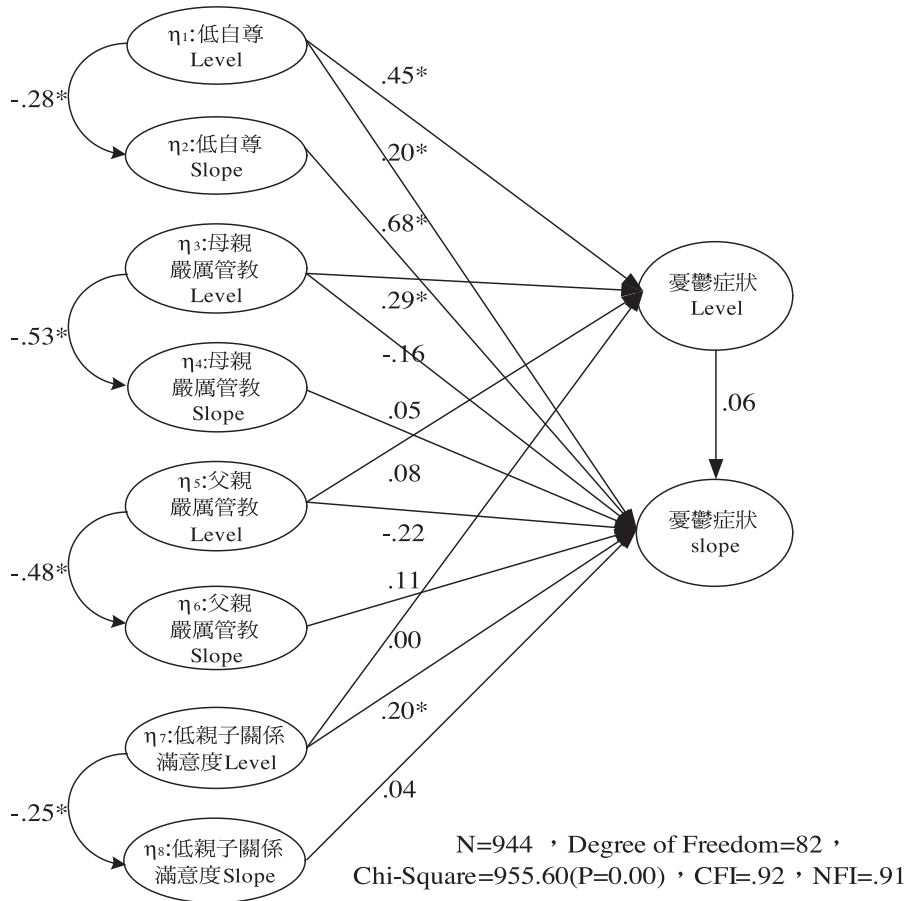
青少年的初始憂鬱狀態並不影響其後的憂鬱症狀發展方向與速率，這個發現說明了：在青少年發展的歷程之中，尚有來自青少年成長脈絡中的其他因子，才是影響其憂鬱症狀平均數變動的關鍵變項。藉由三個觀察時點的縱貫資料，本研究乃得以剖析：個人屬性與家庭脈絡中之危險因子，與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之間的因果關連，並探討不同危險因子在三個觀測期中，各自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變化的影響程度與影響次序。

(二) 個人屬性與家庭脈絡中危險因子與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軌跡

本研究的分析重點在於：青少年的自我認知與對家庭脈絡中之親子間垂直關係的感受，如何影響其自身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長期變化。將青少年個人屬性與其家庭生活場域中之親子間關係，放在同一模型一併檢證的目的：乃在嘗試將多個時點的觀察資料中，個人屬性的成長變化、與親子間關係的持平或變化情形，聯結至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軌跡，以確認這些在理論上可能的關鍵影響因子，是否具有即時或長期的影響，造成個別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發展有所差異？

與圖三基本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的設定方式一致，圖四的多重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的測量指標(包括：解釋變項低自尊、母親嚴厲管教、父親嚴厲管教、低親子關係滿意度，以及依變項憂鬱症狀等)，皆以三個不同時點的重覆測量作為測量指標。每一個潛在變項的起始狀態與其測量變項之間的因素負荷值，都固定統設為1；考量本研究只用三個時點的測量，受限於資料時間點的局限與模型確認(identification)的問題，故設定所有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的斜率皆為「相等時序」(equidistant time steps)，亦即，代表著憂鬱症狀的發展，為典型之線性成長軌跡，在變化速率(斜率)與各測量指標間的負荷值分別設為0、1及2。

至於，各LGC模型的截距與斜率，其潛在變項之間的關連設定，為排除時間先後次序錯置的邏輯問題，圖四模型的設定原則是：前面四個解釋變項的截距，分別



圖四 國中三年低自尊與家庭脈絡危險因子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影響(LGC模型)

有箭頭連至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截距與斜率兩個潛在變項，然解釋變項的斜率，沒有箭頭連至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截距，而只連至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斜率。而四個解釋變項之間，即低自尊、與家庭脈絡三個危險因子的截距與斜率間相關係數(ϕ)，亦同時列入LGC模型的設定與分析。至於四個解釋變項之間彼此的影響，即低自尊與母親嚴厲管教之間的關聯性($\phi_{13} = .25, \phi_{24} = .30$)、母親嚴厲管教與父親嚴厲管教之間($\phi_{35} = .87, \phi_{46} = .86$)、低自尊與低親子關係滿意度之間($\phi_{17} = .38$)、低自尊與父親嚴厲管教之間($\phi_{15} = .31, \phi_{26} = .27$)、母親嚴厲管教與低親子關係滿意度之間($\phi_{37} = .60, \phi_{48} = .35$)、父親嚴厲管教與低親子關係之間($\phi_{57} = .60$)皆列入模型設定並皆達顯著，顯示

青少年個人低自尊、與家庭脈絡中父母親嚴厲的管教、低親子關係之間，具程度上「亦步亦趨」的相互關連性。但是，為了清楚呈現國中三年低自尊、與家庭脈絡危險因子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影響，圖四中並未標示解釋變項之間的關聯性。綜合考量文獻對解釋變項與憂鬱症狀起始狀態、變化率之間關連關係的預測，以及上述之模型設定規則，並參酌模型適配度分析的適配指標評估($\chi^2 = 955.60, p < .05$; CFI、NFI均達大於.90標準)，我們最後確定了圖四所顯示之LGC模型。

圖四的LGC模型分析結果顯示：青少年低自尊的起始狀態($\beta = .45, p < .05$)以及母親嚴厲管教的起始狀態($\beta = .29, p < .05$)，都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有顯著的影響；而低自尊的起始狀態($\beta = .20, p < .05$)、低自尊的斜率($\beta = .68, p < .05$)、與低親子關係滿意度的起始狀態($\beta = .20, p < .05$)，則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變化方向與速率產生顯著的影響。

更詳盡地說，圖四的LGC模型充分反映了，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軌跡，與青少年之低自尊的發展軌跡之間，有著亦步亦趨的情勢。不但青少年低自尊的起始狀態與其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呈正相關，青少年低自尊的斜率與憂鬱症狀的斜率，亦顯著正相關，顯見低自尊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軌跡，具有關鍵而深遠的影響效果。由此推測，在國一時即已顯現低自尊狀態的青少年，其國一的憂鬱症狀起始狀態，即已經比一般國一學生的憂鬱症狀要來的明顯許多。對於在起始狀態即已表現出低自尊與較明顯憂鬱症狀的部分青少年來說，其憂鬱症狀的發展，則可能隨著時間的推演，而顯現惡化的趨向。

至於，家庭脈絡中代表垂直關係的父母親之嚴厲管教，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的影響，似乎沒有想像中那樣大。青少年對於母親之嚴厲管教的評估，只影響其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beta = .29, p < .05$)，而未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方向與速率改變；父親嚴厲管教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的影響，並不顯著。

另外，青少年自評之低親子關係滿意度，與其憂鬱症狀之發展軌跡的關連部分，分析顯示：低親子關係滿意度的起始狀態，對青少年憂鬱症狀起始狀態的影響不顯著($\beta = .00, p > .05$)，但卻會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的上下起伏($\beta = .20, p < .05$)；至於，低親子關係滿意度與青少年憂鬱症狀兩者之斜率間，則呈現不顯著($\beta = .04, p$

>.05)的關係。此結果反映出：青少年若在一開始即對與父母之間的親子關係不滿意，則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發展，會隨著時間而逐漸惡化。也就是說，所知覺到的親子關係滿意度，對於國一時期的青少年來說，很有可能是一種自童年以來，即不斷累積的內在感受；而這種對親子關係不滿意的影響，雖然並未表現在國一時期的初始憂鬱症狀平均數上，但卻將隨時間而展現出惡化的憂鬱症狀。

綜而論之，當青少年感受到來自母親的嚴厲對待，當他們不滿意親子關係時，這些感受會分別反映在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以及憂鬱症狀的變化上。換言之，母親不當管教方式、與低親子關係滿意度兩者，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影響次序，則呈現微妙的不同，家庭脈絡中的危險因子，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具有「次第呈現」的影響效果。此分析發現，更因此突顯了幾個重要訊息：第一、縱貫性的研究資料，確實能提供更多釐清事件來龍去脈的重要關鍵訊息。第二、家庭脈絡下，不良上下垂直關係，對青少年的憂鬱症狀而言，確實有著關鍵性的影響。第三、欲解釋此關鍵性的影響，必須在理論與方法上，仔細觀察記錄青少年的生命歷程，方能針對家庭脈絡中，父母管教、與親子關係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後續變化的影響，藉由前後影響時序的區辨，確認其因果機制。

總結圖四的分析結果：青少年的低自尊，乃是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的最關鍵因素。對於己身的認知與控制感，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的長期發展趨勢。低自尊的青少年，除了表現出較一般青少年為高的憂鬱症狀起始分數之外，其低自尊，亦對憂鬱症狀的變化產生深遠的影響。至於家庭脈絡中的不當母親管教與不良親子關係，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影響，則呈現：部分青少年身處的家庭脈絡，乃是無從選擇的關係結構，青少年對於家庭脈絡關係的評估與感受，顯然是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因素之一。而自模型中低自尊與母親嚴厲管教、低親子關係滿意度之間的顯著關聯性來看，青少年的低自尊同時可能受到家庭脈絡因子的影響，而表現在憂鬱症狀的發展軌跡上。不過，對於那些成長於較不利之家庭的青少年來說，倘若他們確實無法在家庭脈絡當中涵養出自尊，也得不到家庭脈絡中上下垂直關係的適時奧援時，是否仍有其他可藉由個人主動努力而獲得家庭脈絡以外之社會資源與支持的可能性，以改變此因家庭脈絡之不良上下垂直關係型塑而成的結構限

制？本研究主要的目的，首要在於反映出身處不利家庭環境脈絡中，青少年所表徵出的身心健康狀況，以及確認不利的家庭危險因子，對於青少年身心發展軌跡的影響時序。未來，為使囿困於家庭脈絡因素，而展現憂鬱症狀惡化發展的青少年，仍有機會「表現得比預期還好」，能在家庭以外的社會脈絡中，如自「學校脈絡」中，尋找青少年仍可培養生活適應能力、與擴展關係資源的成長基地，顯然是更為積極的作法。至於學校脈絡中，是否存在能改變青少年憂鬱症狀軌跡變化與發展的關鍵因素，則有待日後加入學校脈絡變項進行研究，以進一步地釐清與印証。

五、結論與討論

(一) 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發展軌跡

本研究旨在探析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發展軌跡，特別著重個別差異情形，透過三個時點的重覆測量資料，觀察每一位青少年隨時間演進而各自發展的軌跡，藉由時間動態的考量，清楚地描述出來，藉以深化對青少年憂鬱症狀長期演變的理解。

透過長期重覆測量之貫時性資料與LGC模型的結合運用，並藉由捕捉青少年的憂鬱症狀起始狀態與斜率的變化軌跡，本研究區辨出多個觀察時點，個別青少年之憂鬱症狀分殊成長變化情形。此舉突破單一觀測時點，只能顧及「當下」，無法同時關照歷史時空脈絡的方法困境。本研究資料分析顯示：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發展軌跡，其起始狀態並不能決定未來變好或變壞的斜率方向。換言之，青少年的成長與發展途徑，不會因為其初期的狀況而就此定案。這個研究發現所透露的正面訊息在於：對擁有無限成長發展可能的青少年而言，即便在早期擁有不利之青少年適應，未來都有改變的機會，其可能性確實存在。

分析結果基本上支持本研究提出的第一個研究假設。圖三之個人憂鬱症狀發展軌跡變化的分析結果顯示：青少年的憂鬱症狀起始狀態與其後來的變化，並未有顯著的關聯，反映出：每一位青少年，隨時皆有可能在身心發展的歷程中有不同的發展可能。多個觀察時點的研究設計，讓研究者可藉由斜率的變化方向與速率，捕捉

每一位青少年發展軌跡的獨特動態及轉折。本研究分析發現提醒我們：那些過去可能因考量整體表現之故，而被表面的全體平均數據掩蓋而忽略掉、迥異於一般青少年發展途徑的相對少數，併合貫時性的資料與研究方法的使用，才能將這群憂鬱症狀發展與「眾」不同，但實則在理論上具影響性與解釋力的少數青少年如實描繪出來，如此，亦才能真實地掌握當代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事實。

(二) 個人屬性與家庭脈絡中的危險因子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影響

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焦點，說明了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發展軌跡，並非是同步同軌的發展。至於，造成青少年在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上有所差別的影響因素，則需進一步藉由對青少年生命歷程長期的觀察，特別是主要生活場域中，個人與生活環境脈絡的互動關係，才能掌握造成青少年憂鬱症狀個別差異的關鍵變因。家庭脈絡中的親子互動關係與親子關係的良窳，一直是國內外研究關注及切入的焦點。既存文獻大多致力於探討負面家庭生活經驗、及不良親子互動與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之間的關係，但往往囿於橫斷式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策略，無法同時兼顧關照時間縱深的潛在變因，以致在處理家庭脈絡危險因子與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的關係機制時，只能說明二者間的當下即時關係，而無法追究在共變產生之後，隨青少年自身生命發展、及青少年與外在生活脈絡持續互動的結果，所產生更多的生命歷程轉折與變遷。為突破此囿限，本研究乃嘗試以連續三年追蹤資料做為分析之基礎，闡述青少年長期在負面家庭生活經驗之下，所展現的憂鬱症狀的發展軌跡，以呼應生命歷程理論對於「觀察青少年發展路徑，需長期追蹤觀察」的立論。此舉，可補足過去文獻不足之處，並在納入時間縱深的考量下，重新與既存文獻對話，做為下一階段進一步研究的前導。

運用LGC模型的分析結果：青少年的低自尊，乃是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起始狀態與未來發展的最關鍵因素。由於自尊在青少年早期階段，即已顯示對青少年憂鬱症狀之起始狀態的關鍵性影響，可見青少年對於自身能力的看法及自我的評估，可能在青少年進入國中就讀時，即已逐漸成形，成為左右青少年憂鬱症狀初始狀態的關鍵決定因素。低自尊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變化發展的影響，則更明確地反映：

青少年對於自己的認知與評估，會隨時間演進，而長期地影響其憂鬱症狀的後續發展，且其影響的效果與日遽增。當青少年能對自己產生積極正面的看法、認定自己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時，具高度自尊的青少年，他們所擁有的正向自尊，將成為支撐他們克服來自生命歷程挑戰的力量，在時空脈絡的移轉下，漸能展現正向發展與改變。相反的，低自尊的青少年對自己的負向認知，則可能逐漸成為負向影響身心健康的變因，終而隨著時間的演變，而展現出逐漸惡化的長期憂鬱症狀。本研究分析發現正好呼應「正向心理學」的理論觀點，肯定個人自尊為一項關鍵的內在資源，且是能協助青少年適應發展出「比預期更好」之重要因子。而自低自尊與家庭脈絡變項間的關聯來看，若發現有青少年在早期，即已呈現比其他大部分青少年更低的自尊狀態，此可能意謂著：該青少年可能已長久處於不良的家庭互動關係中，且這些源於家庭脈絡中的變因所造成的負面與長久衝擊，對青少年的身心成長而言，確實是不利的。延伸自此，未來在家庭脈絡之外的其他社會脈絡中，找尋足以取代家庭脈絡、以協助青少年重新獲得健康身心發展的環境保護因子，則更顯重要。我們期望，倘若身處不利家庭脈絡的每一位青少年，能在生命歷程中遇見如同「貴人」角色的重要他人，則這些青少年，或許仍將有機會跳脫家庭結構的限制，在身心發展的歷程上，最終亦仍能有改變的可能。

過去許多探討青少年身心健康與適應問題的文獻，除了找尋個人自尊與青少年憂鬱症狀的關聯之外，更致力於發掘來自生活環境脈絡中的關係，對青少年發展的重要性。Amato(2000)、Conger與Conger(2002)等人即戮力強調：個人在與環境聯結互動的歷程中，所獲得受到支持的感受，乃是個人在面對生命歷程中的挫折與挑戰時，保護個人免於長久受到負向情緒經驗不利影響的資源。本研究則指出：家庭脈絡之中與重要他人關係與感受的負向評估，影響青少年的發展軌跡。在親子互動的家庭脈絡中，母親的嚴厲管教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有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說，來自家庭脈絡之中的重要他人，尤其是母親這個主要照顧者的教養方式，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影響效果，僅及於青少年早期階段，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變化則無長久顯著的影響。但是，家庭脈絡中青少年對親子關係的滿意程度，雖未展現對青少年憂鬱症狀起始分數的影響，卻是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的關鍵因素。簡

言之，家庭脈絡中不同危險因子的影響效果，確實左右著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發展狀態，且具有不同階段時序的影響效果。既存文獻多所揭示負向生活事件、家庭結構改變、失功能父母(黃鈺婷，2007；Courbasson et al., 2002; Wu et al., 2006)、不安全依附(楊雅惠，2003；Lopez, Mitchell, & Gormley, 2002)、父母管教方式或親子關係互動(康維芬，2005；鍾筱萍，2004)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負向影響。與過去文獻一致，本研究亦顯示，家庭脈絡中確實存在諸多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的危險因子。但是本研究採用貫時性資料的結果，則進一步指出：父母之管教行為與親子關係滿意度兩者間，存在著不同時序的作用效果，而這項發現與Bertera(2005)針對正向社會支持與個人關係中的負向互動的研究發現一致，皆顯示負向的關係互動，確實會對身心健康造成更長遠的不利影響。對於青少年來說，母親的嚴厲管教，可能反映的是親子互動的衝突、當下對母親管教態度的反應，至於親子關係滿意度的評估所反映的，則可能是對於親子互動品質的長久感受，因此，分別表現在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不同時序上的作用程度。當然，這些可能的解釋與推測，仍需更多實證研究的驗證，以進一步歸整家庭脈絡中危險因子、與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兩者間的因果關係機制。

近年來，辨認來自生活環境中危險因子的研究趨勢，已逐漸轉向至找尋讓身處危險脈絡中的青少年，仍能正向發展的保護機制。持此正向理論觀點的學者，大多企圖先掌握住縱貫的歷史時間動態，並以個人的演變發展為研究焦點，試圖說明現象的前因後果及發展歷程，並進一步找出能實質產生調節與改變作用的機制，以做為具體改善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的理論依據。事實上，本研究的最終目的，不僅止於闡明青少年在國中三年的憂鬱症狀發展的變與不變、及其成因，我們有一個更為緊要的研究課題，即是：希望能在家庭脈絡之外，積極尋找能讓所有青少年都能有機會一體受惠的有利社會脈絡。在台灣學校教育體制下，成員固定的班級脈絡，對青少年而言，或許是一個值得正視、可以提供來自不利家庭條件的青少年，更多資源與機會的生活脈絡。Wu與Lei(2006)針對班級脈絡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發展之影響的研究，即已發現：班級脈絡對青少年的行為與關係發展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因此，探討學校班級脈絡中，同儕及好友關係的長期互動情況，對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的

影響，探究青少年在班級內的友誼動態網絡(dynamic network)關係、與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之間的因果關聯，可能是先天成長發展條件不良的青少年，所能在不良家庭脈絡之外主動找尋與建構的一個契機。未來，在模型當中納入學校脈絡中的變項，包括如學校的依附感、班級凝聚力、以及青少年之友誼網絡等，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的保護作用，以回答：家庭脈絡中的危險因子，是否會因學校脈絡中良好關係的建立，而能做為那些來自不利家庭青少年的關鍵保護機制這個更深層的研究問題。

本研究基本上嘗試以連續三年追蹤之貫時性資料，輔以LGC的研究方法，企圖釐清：來自家庭脈絡中不利之危險因子，對於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響與時序，試圖突破過去研究所面臨的資料問題，將家庭脈絡因子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響路徑說明詳實。下一階段針對青少年身心健康變化及其動態影響變因之探討議題與方向，則可企圖同時將家庭與學校班級脈絡中重要關係的動態變因，納向LGC模型的考量，並在變項的處理上做不同脈絡與層次面向的細緻處理。如此一來，雖然勢必會因為模型的複雜化，而有更多模型設定與模型適切度的挑戰，然而，當我們能具體掌握到家庭、學校班級脈絡、與青少年身心健康之間的動態連結時，至此，我們才有機會找出引發青少年生命歷程的動態轉折的關鍵因子，讓先天受限於家庭脈絡不利的青少年，也能獲得健康成長的生命機會。

參考文獻

- 吳齊殷、李文傑(2003)：〈青少年憂鬱症狀與偏差行為併發之關係機制〉。《台灣社會學》，6期，119-175。
- 徐世杰(2003)：《青少年憂鬱與社會畏懼、雙親教養態度之相關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陳為堅(2005)：《學校憂鬱傾向學生推估及預防策略之研究》。台北：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 黃鈺婷(2007)：《復原力的力量：個人與來自家庭、學校脈絡中的保護機制對青少年

- 憂鬱症狀改變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
- 康維芬(2005)：《大學生家庭功能、父母教養方式與憂鬱傾向之關係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楊浩然(2001)：《青少年憂鬱疾患及憂鬱症狀之追蹤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流行病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
- 楊順南(1995)：《憂鬱理論的整合研究—認知取向》。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楊雅惠(2003)：《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和壓力因應對情緒經驗的影響歷程之探討：以大四學生的生涯抉擇壓力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
- 鍾筱萍(2004)：《通勤家庭中父母管教方式、親子互動關係與子女憂鬱及焦慮表現之相關》。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Amato, P. R. (2000). The consequences of divorce for adults and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2(4), 1269-1287.
- Bertera, E. M. (2005). Mental health in U.S. adults: The role of positive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negativity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2(1), 33-48.
- Brooks, R., & Goldstein, S. (2004). *The power of resilience: Achieving balance, confidence, and personal strength in your life*.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 Conger, R. D., & Conger, K. (2002). Families & family life, behaviors, social conditions & trends, economic condi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2), 361-374.
- Courbasson, C. M. A., Endler, N. S., & Kocovski, N. L. (2002). Coping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for men with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Current Psychology*, 21(1), 35-49.
- Derogatis, L. R. (1983). *SCL-90-R administration, scoring, and procedure manual-II*. Towson, MD: Clinical Psychometric Research.
- Duncan, T. E., & Duncan, S. C. (1995). Modeling the processes of development via latent growth curve methodolog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2(3), 187-213.

- Elder, G. H., & Conger, R. D. (2000). *Children of the 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amezy, N. (1985). Stress resistant children: The search for protective factors. In J. E. Stevenson (Ed.), *Recent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pp. 213-233). Oxford: Pergamon Press.
- Grotberg, E. H. (1997). *The international resilience research projec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Psychologists, Graz, Austria.
- Lopez, F. G., Mitchell, P., & Gormley, B. (2002). Adult attachment orientations and college students' distress: Test of a meditational model.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9(4), 460-467.
- Masten, A., & Garmezy, N. (1985). Risk, vulnerability,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n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In B. B. Lahey & A. E. Kazdin (Eds.), *Advances in child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8) (pp. 1-52). New York: Plenum.
- Rosenberg, M.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mpson, R. J., & Laub, J. H. (1994). *Crime in the making: Pathway and turning points through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inger, J. D., & Willett, J. B. (2003). *Applied longitudinal data analysis: Modeling change and event occurr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rumpeter, N. N., Watson, P. J., O'leary, B. J., & Weathington, B. L. (2008). Self-functioning and perceived parenting: Relation of parental empathy and love inconsistency with narcissism, depression, and self-esteem.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69(1), 51-71.
- Willett, J. B. (1988).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 the measurement of change. In E. Z. Rothkopf (Ed.),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vol. 15) (pp. 363-381).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 Willett, J. B., & Sayer, A. G. (1994). Using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to detect correlates and predictors of individual change over tim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6(2), 363-381.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1). Chapter 2: Burden of ment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I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d.),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1: Mental health: New understanding, new hope* (pp. 19-45). Geneva: Author.
- Wu, C. I., Huang, Y. T., & Chang, M. Y. (2006). *The impacts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dysfunctions upon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Law and Family Conference, Taipei, Taiwan.
- Wu, C. I., & Lei, M. K. (2006). *Reconstruct research context for adolescent in East Asia: Rethinking the role of parenting practice and deviant peer on adolescent conduct problems embedded in classroom contex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XVI ISA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Durban, South Africa.

The Impact of Dynamic Factors on Trajectories of Early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

CHYI-IN WU, YU-TING HUANG

Purpose: This study uses data derived from a panel study (1996-1999) of Taiwanese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nd adaptation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cross-sectional studies and to model the trajectory of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over time with the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Several latent constructs related to adolescents' low self-esteem and their family context (such as harsh parenting and low satisfaction with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re treated as risk factors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key mechanisms that negatively influenced the initial status and the rate of change in the adolescents'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Methods:** Participants were 944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completed repeated measurements which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ir individual trajectories and the impact of dynamic factors on early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Results:**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low self-esteem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risk factor on the trajectory of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affecting both initial status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the trajectory.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the daily family context is a dynamic latent construct for adolescent depression. The perception of harsh parenting by the adolescent had impact only on the adolescent's initial statu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while low-satisfaction with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long-term changing trajectory of the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Conclusion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impact of dynamic factors on trajectory of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varies over the long term.

Key words: adolescent, trajectory, depressive symptom, dynamic factor,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Chyi-In Wu: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sss1ciw@gate.sinica.edu.tw)

Yu-Ting Huang: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